

縣市菁英對衝突的認知

黃秀端*

- 一、緒論
- 二、研究方法
- 三、對衝突之認知
- 四、不同縣市菁英對衝突的看法
- 五、角色理論與衝突認知
- 六、政黨與衝突認知
- 七、個人社會背景與衝突認知
- 八、綜合討論與結論

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衝突存在，菁英對於衝突的態度是正面抑是負面的，將會影響其對其他問題之態度與處理方式。本文將探討縣市菁英對於是否有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完成的態度，以及他們對此種衝突干擾地方之發展的程度之看法。除此之外，本文將分別討論菁英對十一項問題差異是否會造成居民分裂的看法，並更進一步與他國菁英態度比較。接著，將討論究竟是角色理論、社會化理論、團體理論、抑是環境背景理論較具解釋力。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乃是採自中山大學廖達琪教授所主持、以及趙永茂、黃秀端等多位教授協同主持之國科會研究—「臺灣地方菁英政治文化與決策影響力」之面訪資料。調查訪問於1993年7月至9月間進行。訪問對象包括六個縣市的重要政府官員、縣市議員、該縣市選出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與省議員、社團代表、以及朝野兩黨之縣市黨部負責人。

整體言之，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地方菁英對衝突之態度呈現與他國不同的模式。有六成之地方菁英表示地方有衝突發生，而這些人幾乎都表示此種衝突已經干擾地方的發展，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顯然我國地方菁英對衝突最感到憂心。但是在另一方面，若就各別問題來分析其差異是否會造成居民分裂時，回答會的平均百分比

* 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卻又足最低的。此種平均百分比最低的現象，可能是因為我國地方菁英主要的關切為派系與政治觀點之差異，而對其他衝突卻不甚關切，使得平均百分比被拉低了。

接著我們探討究竟是那些因素足以解釋地方菁英對衝突看法之差異，我們發現社會背景和菁英之職位與菁英對衝突之看法幾乎無關。至於政黨歸屬方面，民進黨顯然對衝突問題較為關切，尤其是在所得、社會背景、省籍、派系以及政治觀點之差異，在控制其它變數之後，皆呈現顯著水準。不過影響地方菁英對衝突看法最重要的因素是縣市本身之差異，人口較多且派系複雜之縣市的地方菁英，顯然對衝突影響之認知較高，對十一項衝突是否會造成居民分裂之平均百分比亦最高，由此可見環境背景理論較能解釋我國地方菁英對衝突之態度。

關鍵詞：地方菁英，衝突，角色理論，社會化理論，團體理論，環境背景理論

一、緒論

「政治社會得以建立的必要因素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有所衝突，然而也由於人類利益之共同性，使得社會之建制成為可能。換言之，由於利益之重疊，才有社會約束之產生；假如不同利益之間沒有共同點，那麼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Rousseau, 1963: 69) 法國名哲學家盧梭認為衝突使得人類政治成為必要，然而利益之重疊使得政治成為可能。衝突是人類社會中難以避免的，因此瞭解衝突之重要性，乃是政治學中很重要的課題。

學者對於衝突之研究不僅汗牛充棟，且頗有爭論。這些爭論不外乎是：衝突的重要性，衝突的表達與其代表性的功能，衝突的持久性與暫時性，衝突的來源，衝突的影響，菁英對於衝突之認知，以及此種認知與政治態度和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衝突同時被認為與政治系統的有效性與穩定性有關。

中國人傳統上一向強調以和為貴，衝突被認為是破壞團結與社會安定的因素，因此衝突是不可欲的，是不應該存在的。然而在民主多元化之社會下，團體與團體之間以及政黨與政黨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在所難免。我國由威權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同時，地方菁英對於衝突的認知究竟如何，以及那些因素影響對衝突之認知，乃是本文探討之重點。

臺灣對於地方菁英的研究並不多，而這些研究多集中於對派系之研究，如對地方派系權力結構的研究(紀俊臣, 1977; 蔡明惠, 1987; 彭基原 1988; 林仲修, 1991)，地方派系對地方及建設的影響(趙永茂, 1978; 陳陽德, 1978; 苗蕙敏, 1991)，或是研究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間的關係(黃德福, 1990; 陳明通、朱雲漢, 199)。然而卻少有對地方菁英政治態度之探討(趙永茂, 1987)，特別是對衝突之看法。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衝突存在，菁英對於衝突的態度是正面抑是負面的，將會影響其對其他問題之態度與處理方式，因此對此問題之研究與瞭解有其重要性。

根據過去學者研究顯示，不同國家對於衝突之認知或對衝突之強調程度有顯著之不同(Putnam, 1973; Eldersveld, 1951; Eldersveld and Siemienska, 1989: 313)。這些研究亦同時指出菁英的角色地位，所屬政黨與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階級皆可能影響菁英分子對於衝突之觀點。這些因素究竟那一項對菁英態度之影響最大，則因學者之理論不同而有差異。有些學者認為菁英衝突取向乃是早期政治社會化之產物。Putman (1973: 136) 強調人類對於衝突的看法，在人生之早期就已發生，而且幾乎很少受到晚期或後來政治經驗的影響。角色理論

者認為政治行為與態度是由於個人所處之角色對此個人要求與期望之結果（Wahlk et al., 1962; Suleiman, 1974）。團體決定論者則主張菁英所屬的團體和政黨會影響他們對衝突之取向。環境背景理論（Context Theory）者則以為菁英分子所處的社區環境纔是決定他們對衝突認知之主要因素（Jacob, 1971; Eldersveld et al., 1995）。在臺灣的地方政治中，菁英份子對衝突之認知究竟與他國之研究是否相同以及那些因素影響此種認知之差異，將是本文研究之焦點。

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乃是採自中山大學廖達琪教授所主持、以及趙永茂、黃秀端、陳文俊、梁元棟等多位教授協同主持之國科會研究—「臺灣地方菁英政治文化與決策影響力」之面訪資料。

臺灣地區縣市級地方自治單位共有五市十六縣，由於受到財力、人力、以及時間等各項因素之限制，不可能完成二十一縣市之訪問，因此本研究僅抽取六個縣市，包括四縣二市，作為研究之地區。

為了顧及樣本的均衡性與代表性，本研究所抽取之樣人是依據下列四個條件而取得的：

- (1)區域之均衡：北部兩個，中部一個，南部兩個，東部一個。
- (2)政黨均衡：包括四個國民黨執政之縣市，兩個民進黨執政之縣市。
- (3)人口多寡之均衡：人口六十萬以上之縣市三個，六十萬以下之縣市三個。
- (4)經濟發展之程度：經濟情況較好的縣市三個，經濟情況較差的縣市三個。

根據此四個條件抽出基隆市、臺南市、新竹縣、臺中縣、高雄縣以及花蓮縣六個縣市作為研究之地區。其中新竹縣和高雄縣為民進黨執政之地區，其它四縣市則為國民黨執政之區基隆市、新竹縣和花蓮縣的人口數在六十萬以下，而臺中縣、高雄縣以及臺南市則超過六十萬。另外，基隆市、臺中縣、臺南市之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而新竹縣、高雄縣、以及花蓮縣之發展程度則較低。

整個調查訪問則於 1993 年 7 月至 9 月間分別由不同的教授帶領進行。訪問對象包括此六個縣市的重要政府官員，如：縣市長以及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另外由這六個縣市選出之民意代表亦在訪問對象之內，包括縣市議員、該縣市選出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與省議員。除了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之外，其它可能影響地方政治事務或在地方上有某些政治影響力的人，如：農會、漁會、

水利會、工會、商會、信用合作社、婦女會、青商會、獅子會之主要負責人（理事長、主席、會長、總幹事之類）亦是被訪問對象。最後，朝野兩黨之縣市黨部主委及書記長亦在訪問樣本之內。總共得有效樣本 372 份。

爲了使此研究能夠與 Eldersveld 之地方菁英跨國研究相配合，有關菁英對地方衝突之看法，乃是採取 Eldersveld (1981, 1989) 跨國菁英研究的問卷題型，稍加修潤而來。主要有下列三道題目：

- (1) 許多縣市中存在的衝突會干擾地方政府採取有效行動來解決問題，在您的縣（市）中是否有些重大的衝突也正干擾地方事務的完成？
- (2) 您認爲這些衝突對地方發展的干擾大不大？
- (3) 以下各種差異是否已經明顯造成您這一縣（市）居民之間的分裂？
 - (a) 老人與青年人之差異
 - (b) 教育差異
 - (c) 所得差異
 - (d) 宗教信仰的差異
 - (e) 派系的差異
 - (f) 政治觀點的差異
 - (g) 城鄉差異
 - (h) 勞工與雇主的差異
 - (i) 社會背景的差異
 - (j) 省籍差異
 - (k) 期望社會變遷與反對社會變遷差異

本文將就此來探討縣市菁英對於是否有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完成的態度，以及他們對此種衝突是否會因此干擾地方之發展的看法。除此之外，將分別討論菁英對以上十一項問題差異是否會造成居民分裂的看法，並更進一步與他國菁英態度比較。接著，將更進一步討論究竟是角色理論、社會化理論、團體理論、抑是環境背景理論較具解釋力。

三、對衝突之認知

根據我們對於基隆市、臺南市、新竹縣、臺中縣、高雄縣以及花蓮縣六個縣市之菁英所做的訪談顯示，有將近六成（59.8%）的受訪菁英表示該縣市有一些重大衝突正干擾地方事務之完成，比美國的 64% 爲少，但是比荷蘭的 53

%和瑞典的 24% 為多 (Eldersveld, 1995: 98)。當更進一步請他們列舉出一兩項重大衝突事件時，最常被提到的是與環境污染有關的問題，如：環保與經濟發展之衝突、垃圾污染、焚化爐之興建、垃圾掩埋場與水資源污染等問題。其次是派系衝突的問題。由於近年來環保意識逐漸加強，衍生不少環保抗爭衝突，造成地方不少困擾，因此不難想見為何不少地方菁英提及與環保和污染有關之問題。另外，各縣市中地方派系之衝突由來已久，不同派系之成員往往老死不相往來，並且不能同時出現於某一個場合，所以派系衝突問題是第二項經常被提及之衝突。若是再更進一步詢問那些認為有衝突存在者，此種衝突對於地方之發展干擾大不大時，有高達 68.8% 的受訪者回答非常大，28.1% 認為造成部分干擾，只有 30% 回答不會造成干擾。換言之，有高達 97% 對衝突有認知之地方菁英，感到此種衝突對地方發展的負面影響。瑞典人較不關切衝突對地方的影響，僅有 24% 的地方菁英認為衝突會干擾地方發展。美國人對衝突的影響較為悲觀，但是也只有 67%，比我國之 97% 要少了 30 個百分點（見表一）。這可能與傳統上衝突被視為是不可欲的情況有關。中國人往往強調人際或社會關係之和諧，有時候寧可犧牲個人之利益，來維持和諧之人際關係，起碼要維持一種表面上之和諧關係（楊國樞，1988: 15）。衝突如果被視為是反功能性的（dysfunctional），自然會認為衝突會影響政治的發展，甚至威脅民主政治的成長；衝突如果被視為是具有正面性的，對於衝突的看法自然會較樂觀。

國人對和諧與共識之強調，可以從另外兩個問題看出。表一中顯示，有 61.4% 的地方菁英認為維持地方和諧比完成地方建設更為重要，但是在美國、瑞典、及荷蘭則分別只有 13%、19%、與 29%，其差異不可謂不多。同時，回答地方領袖應修正其作法以維持共識者，更高達 94.7%，而美國、瑞典、及荷蘭則分別為 38%、50%、及 32%。

為了與他國之菁英訪談結果比較，問卷中列舉了十一項不同的問題，一一詢問受訪者這些問題會不會造成地方居民之分裂。由表二中可以看出，有 72.3%（包括非常明顯和明顯者）的受訪菁英表示地方派系衝突會造成地方居民分裂，居十一項問題之冠。其次是政治觀點之差異，亦佔 70%。名列第三和第四的則是所得與教育之差異，不過其比例遠低於前兩項甚多，分別為 36.7% 和 35.8%。宗教和省籍的差異則是排名最低的兩項，分別只有 15.6% 和 19.2%。十一項衝突中回答非常明顯和明顯會造成居民分裂之平均為 35.6%，遠低於瑞典之 73%，美國之 66%，以及荷蘭之 43%。前面提到我國地方菁英認為衝突會干擾地方發展的百分比為四國之冠，然而就各別項目之平均，卻是四國最低

的。我國地方菁英對衝突的看法顯然和他國有所不同。Eldersveld (1995：98) 發現美國和瑞典兩國之菁英認為所得差異是造成居民分裂的百分比最高，分別為 84%和 91%。至於荷蘭則以老年與青年之差異以及贊成變遷與反對變遷之差異百分比為最高（皆為 56%），其次為所得之差異。相反地，我國地方菁英較關切的是政治性問題的衝突，如派系和政治觀點之差異，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顯然不足。此種結果再度證明了 Eldersveld 所言不同政治系統間的差別。

表一：四國地方菁英對衝突看法之比較

	臺灣	美國	瑞典	荷蘭
有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完成 (%)	59.8	64	24	53
衝突對地方干擾之大小 (% 回答非常大及有一些者)	97	67	24	51
各項衝突是否造成居民分裂之平均(%回答非常明顯和明顯)	35.6	66	73	43
維持地方和諧比完成地方建設更為重要(%回答同意與非常同意)	61.4	14	19	29
地方領袖應修正其作法以維持共識(%回答同意與非常同意)	94.7	38	50	32

**美國、瑞典、和荷蘭三國問卷中包括八項不同之衝突，即老人與青年之差異、教育差異、所得差異、宗教信仰的差異、政治觀點的差異、城鄉差異、勞工與雇主的差異、期望社會變遷與反對社會變遷之差異；而臺灣的問卷中，則除了前面八項之外，再加上派系的差異、社會背景的差異、以及省籍差異。若只是八項之平均，則只有 33.6%。資料來源：美國、瑞典、和荷蘭三國之資料來自於 Samuel J. Eldersveld, et al., *Local Elit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U. S.,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 Boulder：Westview. 1995.

表二、地方菁英對十一項問題之衝突認知

	非常明顯	明顯	不太明顯	完全不明顯
老年與青年	5.3	17.7	59.6	17.4
教育	5.4	30.4	54.1	10.1
所得	3.6	33.1	56.3	7.0
宗教	1.4	14.2	63.4	21.0
派系	23.1	49.2	25.8	1.9
政治觀點	17.8	52.2	28.6	1.4
城鄉差異	4.8	23.1	63.2	8.8
勞工與雇主	4.8	26.6	59.6	9.0
社會背景	1.4	29.2	59.2	10.2
省籍差異	2.0	17.9	65.9	14.2
變遷與否	4.2	24.5	62.5	8.7
平均	6.7	28.9	54.4	10.0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之調查顯示，我國八十二年國民平均所得最高與最低之差距，由八十一年之 5.24 倍，擴大至 5.45 倍，寫下近三十年來所得差距最大紀錄。而一般民眾之主觀感受，正反映了此種貧富距離日益加大之現象。民國八十一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三次訪問結果，得知有 58.5 % 之臺灣地區民眾表示，大企業目前在臺灣社會的「政治」勢力太大。而另一項由徐火炎教授所主持之臺北縣立委選舉研究亦得出，有 79.1% 之北縣選民認為社會變得有錢的人愈來愈有錢，窮人卻愈來愈窮。在此種主客觀之貧富不均之評價下，地方政治菁英卻只將其焦點放於派系之衝突，顯然與他國菁英相較，我國縣市菁英對此問題之關切程度相當缺乏。

除了瞭解地方菁英對衝突的看法之外，本文將更進一步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菁英對衝突認知差異。這些因素包括縣市、職位、政黨、社會背景、世代、性別等差異。

四、不同縣市菁英對衝突的看法

環境理論者強調菁英所處之環境會影響他們對政治之態度。Glaser(1994) 在研究白人之種族態度時，發現種族環境本身會影響種族態度。不同縣市之間由於發展程度相異，地理位置之差異，以及人口多寡不同，所面臨的問題也可

能不一樣，地方菁英所發展之政治態度因而有所不同，其對衝突之認知才可能不同。為了使得不同條件之縣市皆有機會納入本研究範圍，前面已提到此次抽取之六個縣市，既考慮到區域之均衡、人口之多寡、經濟發展程度，不考慮到不同政黨執政情況。

由表三可以明顯地看出，不同縣市之地方菁英對於衝突對地方事務之干擾的看法確實有顯著之差異，其關聯為 0.27。其中以高雄縣的菁英對於衝突之認知為最高，高達 74.3%，其次為臺南市的 70%，再其次為新竹縣和臺中縣，分別為 66.7%和 57.1%。六縣市中只有基隆市和花蓮縣之菁英認為衝突會妨礙地方事務完成的百分比低於百分之五十，分別為 44.4%和 40.8%。基隆市幅員小，人口少；而花蓮縣地處東部，人口稀少，衝突因而較少。衝突認知最高之高雄縣與衝突認知最低之花蓮縣，其百分比相差 33.5%之多。當更進一步詢問回答有衝突干擾地方事務者，這些衝突對地方發展的干擾大不大時，則各縣市皆無顯著差異，大部份的受訪者皆認為干擾非常大。由於前面已經提到有高達 97%的地方菁英表示衝突對地方發展的干擾很大，幾無差異可言，因此該問題在本文中將不多討論。

表三：對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認知與縣市之關係

	高雄	臺南	新竹	臺中	基隆	花蓮
有衝突	74.3 (52)	70.0 (42)	66.7 (32)	57.1 (44)	44.4 (24)	40.8 (20)
無衝突	25.7 (18)	30.0 (18)	33.3 (16)	42.9 (33)	55.6 (30)	59.2 (29)

Chi-square = 22. 5; D. F. = 5; P < 0. 001

若是我們更深入分析六縣市菁英分別對十一項問題的看法，由表四中可以發現，與其它十項衝突相比，除了基隆市與臺南市之外，其他四縣市之菁英認為派系衝突會影響居民分裂的比例最高，可見派系衝突的嚴重性。高雄縣有高達 91 %的菁英表示派系差異非常明顯或明顯，位居第一。臺中縣則是三次於高雄縣被認為差異明顯之地區，其百分比亦達 89.8%，再其次為新竹縣之 81.6%。高雄縣黑紅白三派之衝突，由來已久，眾所周知。起初是紅白兩派相互傾軋，派系界線嚴明，不同派系之間甚至不論及婚嫁，互不至對方開設之醫院或商店。由於對立尖銳，互不相讓，使得黑派得以從夾縫中生存（自立早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臺中縣之紅黑兩派相爭，已歷經三十多個寒暑，

是全省地方派系色彩最濃厚之縣市之一（劉超，1985：97-111）。新竹地區的政治人物，黨政官員，地方百姓，每次談到選舉，首先要探究的是某某候選人是屬東派還是西派（陳騰芳，1985：58-71）。換言之，候選人順理成章的就會被歸為某一派系，不是東派就是西派。近年來雖然東西兩派有式微現象，代之而起的宗親，仍然不脫派系色彩。臺南市之菁英雖然對衝突之認知相當高，但是認為派系會造成居民分裂者卻只有 55.6%，僅高於基隆市。究其原因在於南市之地方派系不像高雄縣和臺中縣之地方派系根深蒂固，淵源流長，其派系基礎較為薄弱。任何現實利益之改變，隨時可能造成派系之拆夥或結合，派系間的界線因此相當模糊，不似高縣與中縣壁壘分明。為何臺南市菁英對衝突的認知那麼高呢？根據表四的結果顯示，可能是政治觀點之歧異所致。有 77.8%之菁英認為政治觀點之差異會造成居民之分裂。基隆市雖然也有派系，但是與其他縣市比較，派系衝突一向不尖銳，尤其近年來已逐漸式微，因此該市菁英認為派系衝突會形成分裂之比例亦最低（唐志成，1985：9-22）。甚至有不少此次受訪之菁英，以他們無派系困擾為自豪。

表四：縣市與十一項衝突

	臺中	高雄	臺南	新竹	花蓮	基隆	顯著水準
老年與青年	36.4	18.5	12.7	23.0	14.0	30.2	0.003**
教育	46.7	32.8	22.2	36.0	34.0	41.5	0.2321
所得	50.0	32.4	31.8	28.5	38.0	34.6	0.06
宗教	21.3	14.1	19.1	6.1	24.4	5.8	0.04*
政治觀點	89.8	77.6	77.8	58.0	62.0	52.8	0.001**
城鄉差異	36.5	35.4	17.5	27.6	38.8	9.4	0.07
勞工與雇主	36.0	49.3	33.3	18.4	18.4	24.1	0.0002**
社會背景	37.9	36.4	35.8	28.5	30.6	20.8	0.02**
省籍差異	15.4	24.2	42.9	6.1	12.0	13.4	0.003**
變遷與否	28.6	27.7	25.8	28.5	38.8	24.6	0.037*
平均百分比	43.67	39.95	34.05	31.12	28.30	27.32	——

**為 $P < 0.01$

* 為 $P < 0.05$

臺中縣在各項目中，不是名列衝突排行榜第一名，就是名列第二，以平均 43.67 居六縣市之首，並且在老年與青年、教育、所得、政治觀點、以及社會

背景之差異六項皆是位居六縣市之冠，而在派系、城鄉、與勞工和雇主之差異，則排名第二。總平均僅次於臺中縣的是高雄縣，該縣最嚴重的衝突除了前面提到的派系恩怨之外，政治觀點之差異與勞資之衝突也是當地菁英感到關切的。高雄縣有三大派系鼎足而立，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層出不窮，同時又有民進黨的縣長與國民黨掌控的議會，因此政治觀點的分歧，乃是不足為奇之事。另外，高雄縣有林園工業區和其他大工廠之設立，因此勞工與雇主之間的糾紛亦不少，所以有 49.3% 菁英顯示對勞資衝突嚴重之關切。臺中縣與高雄縣不僅派系衝突淵源已久，政治觀點之歧異自不在話下，而同時兩縣皆是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大縣，因此問題與衝突自然較為複雜。

基隆市是六縣市中對十一項問題的平均衝突認知最低的，只有 27.32%，在宗教、派系、政治觀點、城鄉、社會背景、省籍、贊成與反對變遷之差異，不是位於各縣市之末，便是倒數第二。花蓮縣則以平均 28.3% 位於倒數第二。不過，花蓮縣之菁英對於城鄉差異，宗教紛歧，以及贊成與反對變遷之衝突等三項，卻是居六縣市之首。位於臺灣東部之花蓮，其發展與建設皆不及其它各縣市，因此當地菁英對於城鄉差異有深刻體認。同時，花蓮由於發展落後，慶幸的是環境污染也是最少的，在面臨產業東移與環境保護之痛苦抉擇，使得贊成變遷與反對變遷者各執一詞。宗教問題在各縣市皆被視為最不重要的問題，但是花蓮卻以 24.4% 獨領風騷，比基隆市的 5.8%，多出 18.6 個百分比。究其原因在於花蓮縣是宗教活動最興盛的縣市。早期基督教會深入東部各山地鄉，福音遠播，但是另一方面，近年來慈濟功德會在花蓮形成另外一股風氣，地方領袖自然會感受到此種不同。總之，基隆市與花蓮縣一方面派系衝突不大，另一方面人口較為稀少，事情較為單純，因此衝突也較少。

前面雖然提到派系與衝突認知之關係，但是派系之資料，僅是來自於學者或是記者對於該縣市派系互動之描述，並無具體之資料。為了要更進一步證明此種關係之存在，在我們的訪問中，曾經詢問受訪者，若是其遇到問題或要制定一項政策草案時，會尋求誰的支持？回答尋求所屬派系支持的百分之最高之縣市為臺中縣，其次為高雄縣。表五中可以看出派系支持與衝突認知之關係。

所謂的環境理論，可能包含的變數很多。除了探討派系之外，本文還將探討人口多寡與經濟情況問題。表五使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縣市人口多寡與菁英衝突認知之密切關係。臺中縣人口居六縣市之之冠，地方菁英對衝突之認知也最高。高雄縣則在人口與衝突認知皆居次。換言之，衝突認知之排名與人口多寡正好成正比，只有基隆和花蓮的順序有些許不同，不過兩縣市之

人口僅差 2,404 人，且在過去幾年一直是花蓮人口稍多於基隆，近兩年來基市人口才稍為增多。同時，於表五中亦可得知，衝突分裂平均分數最高之兩個縣市，一為國民黨執政，另一為民進黨執政；一為較富庶之縣，另一為較貧窮之縣。顯然執政政黨之不同，以及經濟發展程度與菁英衝突無關聯。

表五：縣市人口多寡、經濟情況與十一項衝突認知之關係

	對十一項衝突平均認知之排名	人口多寡之排名	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排名	尋找派系支持百分比排名
臺中縣	1	1	2	1
高雄縣	2	2	5	2
臺南市	3	3	1	4
新竹縣	4	4	4	3
花蓮縣	5	6	6	6
基隆市	6	5	3	5

資料來源：人口、收入資料來源為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aiwan Province, 1992.

大體言之，各縣市不僅對衝突是否會干擾地方事務之完成之看法有顯著不同外，而且若以十一項問題分別觀察，除教育差距不具顯著水準以及所得和城鄉差距接近顯著水準外，其他八項皆達顯著水準（見表四）。各縣市之差異又以派系影響居民分裂的認知相差最多，最高和最低相差之百分比高達 47.8%。

五、角色理論與衝突認知

到目前為止，我們確實發現地方菁英對衝突之態度因縣市而有所不同，似乎是較合乎環境背景理論的觀點。但是在下定論之前，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檢驗究竟菁英個人之因素是否會影響其對衝突之態度，這些因素包括所處之地位、黨派之歸屬、社會背景、以及性別。

「你所代表的立場往往決定於你所處之地位」，Graham T. Allison (1971：176) 以官僚模式分析古巴危機時，提出政客與官僚甚至不同部門之官僚，因所處地位不同，其立場與看法亦有所差異。根據韋伯 (Max Weber) 傳統對官僚之分析下，國會議員等政客是民選出來的代表，他必須反映選民的利益，

並且具有濃厚之黨派色彩，至於官僚是專家，應該是中立的執行者（Gerth & Mills, 1960）。官僚所關心的是效率，服從層級節制的權威，尋求技術性的解決方案，而忽略人性化的關係。在此種對民選議員與技術官僚的二分法之下，韋伯看到的是民選官員與官僚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Robert Putnam (1975：19-22) 更進一步強調政客與官僚之間由於甄選的過程與管道不同，因此對事情之認知亦有所不同，同時一般人對此角色的認知與期望亦有所不同。但是有不少學者不同意此種二分法。Almond and Powell (1966：101) 認為不管是政客或是官僚基本上都直接與利益團體和決策者發生密切關係，他們同樣具有提出利益，集結利益，以及將其轉換成爲政策之功能。

Aberbach et al. (1981：9-16) 提出另外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政客與官僚之互動模式。他們認爲近來的發展趨勢是官僚不可避免的參與政策的決定，也有他們的利益所在，然而兩者仍是有別的。政客所代表的利益較爲廣泛，而官僚則僅傳達與其工作領域有關的壓力團體之利益，其範圍較爲狹窄。一位專業且具有經驗之官僚企圖去對已經被精確定義的問題尋求技術上可行的方案，而政客則以政治原則和政治優勢來定義問題。官僚注重手邊問題的解決，政客則強調宏觀的藍圖，以及共同的利益。官僚企圖尋求共識的解答方式，政客則承認多元利益之存在，因此尋求一個較實用的方案。兩者作風之差異亦導致實質上對問題看法之不同。政客有較強烈之意識形態，對於國家在社會改革中扮演什麼樣之角色以及如何將其運用於實務上，持有較強烈與一貫的看法。反之，官僚缺乏對意識形態的堅持，使得他們不得不站在中間的位置，而無法提出激烈改革之建議。既然官僚強調對衝突的管理，企圖尋求共識，因此他們對衝突的關切與對衝突嚴重性之看法應甚於民選之政客。

在我們的樣本中亦包括地方黨部人員和重要社團負責人，黨職人員雖非民選代表，亦非地方官僚，但是因負責地方黨務，勢必對地方有相當程度之瞭解，亦有相當影響力。至於地方社團代表，皆是選舉時各政黨及候選人爭相拉攏之對象，其影響力亦不難想見。所以，除了政客與官僚之差異外，我們也期望專職之黨工人員與不具官方身分的地方社團代表，因角色之不同，對衝突之認知亦可能不同。

表六的結果顯示不僅官僚與政客對於是否有衝突妨礙地方事務之完成的看法並無顯著不同，而且黨工人員和地方社團人員對此之看法亦無不同。同時，他們對於這些衝突是否明顯影響地方的發展，看法亦無甚差別。換言之，職位之不同並未導致菁英對衝突影響地方發展認知之差別。若我們就菁英對十

一項事務的觀點來加以分析，除了派系之衝突接近顯著水準外，在其他問題上皆沒有顯著之不同（見表七）。黨職人員必須參與選舉之輔選和組織動員，他們對派系衝突較為敏感，對衝突之體認亦較為深刻，因此有 90%之黨職人員表示地方派系衝突會造成地方之分歧。至於地方社團代表對衝突之認知亦相當高，可能是很多社團代表如農會、漁會、合作社主席等本身就是派系中人物，即使與派系無淵緣，也是各派選舉時爭相拉攏的對象，因此他們對此亦有深切感受。民意代表由於他們是選民直接選出來的，且經常在議會協調談判，並常扮演政府與民眾之橋樑，所以他們較能承認多元利益之存在，也較能容忍衝突之不可避免，因此他們認為派系衝突會造成分裂之比例便較低。但是在政治觀點及省籍問題方面，民意代表較行政官員和社團代表顯示嚴重關切，不過兩者皆未達顯著水準。黨工人員對於各項衝突分裂（宗教除外）之看法皆是最高的。不過他們由於人數過少，有分析上之困擾，因為這部份人員也是最排斥接受訪問的一群。特別是訪問期間，距縣市長和議員選舉日期只有四、五個月，他們常以此時不宜回答政治性問題之問卷，而加以婉拒。

表六：對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認知與職位之關係

	行政官僚	民意代表	社團代表	黨職人員
有衝突	60.2 (56)	60.8 (11.5)	56.1 (37)	60.0 (6)
無衝突	39.8 (37)	39.2 (74)	43.9 (29)	40.0 (40)

Chi-square = 0.47; D. F. = 3; p = 0.924 (p > 0.05)

表七：職位對十一項問題之衝突認知之關係

	行政官僚	民意代表	社團代表	黨職人員	顯著水準
老年與青年	19.8	26.9	15.9	30.0	0.77
教育	35.2	37.8	28.9	50.0	0.49
所得	37.4	36.3	33.3	60.0	0.44
宗教	20.9	13.7	15.9	0.0	0.18
政治觀點	73.9	68.8	76.8	90.0	0.06
城鄉差異	63.1	72.5	71.0	80.0	0.19

勞工與雇主	35.2	29.4	29.0	50.0	0.53
社會背景	28.6	31.2	29.0	50.0	0.81
省籍差異	15.4	23.4	14.4	30.0	0.47
變遷與否	28.6	28.5	25.0	60.0	0.61
平均百分比	34.87	36.24	32.85	50.00	——

本文的發現與 Samuel Eldersveld (1995: 102) 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Eldersveld 對於美國、瑞典、與荷蘭三國菁英之研究，亦得出他們對衝突之看法不因職位而有所不同。

六、政黨與衝突認知

歷年來國內外的選舉研究和民意調查皆顯示政黨的不同，會造成政治態度上相當大的差異 (Converse, 1964)。Putnam (1973: 106, 129) 認為左翼政黨較傾向於強調「衝突」，右翼政黨則較傾向於強調「和諧」。S. Eldersveld (1981: 240) 對七個國家的政治領袖的研究亦發現左派份子較傾向於在衝突模式的政治中運作。但是 Eldersveld (1995: 104-6) 在對美國、瑞典、和荷蘭三國的地方菁英訪談後，卻發現地方菁英對衝突的意識不因政黨之歸屬而有所不同。此是否意謂政黨意識形態之差異在地方反而不如中央來的明顯。換言之，地方菁英的政治態度受到地方政情的影響遠大於意識形態的爭議。

在意識形態上，國民黨較支持統一，民進黨則傾向主張臺灣獨立。若以左右來區分政黨之意識形態，則前者屬於右翼政黨，後者為左翼政黨，因此我們預期民進黨應較強調衝突之重要性。表八中顯示，有 59.4% 的國民黨地方菁英認為有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進行，而有 67.6% 的民進黨地方菁英對衝突的影響有認知，至於無黨籍者則只有 56.7% 以為有衝突妨礙地方事務之進行。民進黨確實意識到較多之地方衝突之影響，但是兩者僅相差 8.2 個百分點，差異並不大。若是我們再更進一步詢問這些衝突對地方發展的影響大不大時，認為對地方干擾非常大者仍舊是以民進黨籍的 78.3% 為最高，國民黨籍的 68.6% 次之，至於無黨籍者則僅有 60.0%，統計上正好呈現顯著水準。由此可見民進黨確實較國民黨關切衝突對地方之影響。

研究地方菁英政黨差異最大的困擾在於民進黨在地方上紮根不深，因此在立法院佔有 31.7% 席位的民進黨，在我們訪問的樣本中卻只有 9.5%，國民黨則

佔 82.1%的絕對多數。在民進黨員人數過少之情況下，使得統計上之分析不易。

表八：對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認知與政黨之關係

	國民黨	民進黨	無黨籍
有衝突	59.4 (174)	67.6 (23)	56.7 (17)
無衝突	40.6 (119)	32.4 (11)	43.3 (13)

Chi-square= 1. 01; D. F. =2; P=0. 603 (P > 0. 05)

就 11 項是否造成居民分裂的問題來看，民進黨的地方菁英在每一個問題上對於衝突的意識確實均較國民黨為高，前者之平均百分比為 48.9% ，後者為 34.2%（參看表九）。雖然如此，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水準的只有教育、所得、社會背景、省籍、以及贊成與反對變遷等五項。其中又以贊成與反對變遷是否造成居民分裂，兩黨菁英的觀點最為分歧，相差 23.5 個百分點。民進黨主張改革，要求變遷，而國民黨則是在位四十多年的執政黨有保守僵化的趨勢，不願意承認社會對於變革之需求，因此兩黨對於變遷與否問題之差異最大。其次是省籍差異問題，國民黨中認為省籍差異足以影響居民分裂者只有 18.2%，民進黨卻有 39.4%，相差 21.2%。國民黨一向強調省籍和諧，而民進黨沿襲過去反對運動的傳統，強調本土化，臺灣意識，臺灣人出頭天，甚至強調臺灣獨立，因此對於省籍衝突問題較為敏感。再其次是社會背景，所得，以及教育差異之問題，此三者有連帶關係。民進黨的支持者不乏來自於中下階層，在收入以及教育程度上皆較為低的選民，因此民進黨菁英對於居民間社會背景和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感受較為深刻。

表九：政黨對十一項問題之衝突認知關係

	國民黨	民進黨	顯著水準
老年與青年	23.8	27.3	0.2197
教育	34.3	45.5	0.0473*
所得	34.1	54.5	0.0028**
宗教	15.0	15.1	0.4769
派系	70.7	87.9	0.1993

政治觀點	68.7	87.9	0.0711
城鄉差異	28.1	33.4	0.6628
勞工與雇主	28.8	48.5	0.1046
社會背景	27.8	48.5	0.0093**
省籍差異	18.2	39.4	0.0093**
變遷與否	26.5	50.0	0.0178*
平均百分比	34.2	48.9	——

**爲 $p < 0.01$

* 爲 $p < 0.05$

大體言之，民進黨確實是對於衝突的認知高於國民黨，特別是對於贊成與反對變遷、省籍、社會背景、所得、教育等問題之差異。似乎是民進黨對於社會問題之關心程度高於國民黨。至於在其它問題上則兩黨差異並不是很大。

七、個人社會背景與衝突認知

研究菁英的學者常強調菁英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態度與價值，這類的學者我們常稱之為菁英整合理論者，Lasswell and Lerner (1965: 8-9) 稱此種假設為凝聚假設 (agglutination hypothesis)。促成菁英整合的理論包括社會同質性 (social homogeneity)，甄選模式 (recruitment pattern)，人際互動 (personal interaction)，價值共識 (value consensus)，團體凝聚力 (group solidarity)，和制度上的脈絡 (institutional context) (Putnam, 1976)。這幾項因素特別以社會同質性，甄選模式，和價值共識最為重要。

菁英若擁有共同的社會背景、教育、工作經驗和甄選模式，便容易凝聚在態度上的共識，而此種社會同質性，我們很容易比較菁英內部之差異而得知 (Putnam, 1976: 109)。不過有些學者認為共同之背景並不見得會直接導致菁英價值之整合，但是共同之背景有助於促進菁英份子之間的互動，此種互動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其價值或意見之凝聚，此種理論又被稱為菁英互動網絡 (Dye, 1983: 169-190; Higley & Moore, 1981: 581-597; Aberbach, Putnam and Rockman, 1981: 209-237)。

Aberbach, Putnam and Rockman (1981) 發現西歐六個國家 (英、法、德、義、荷、瑞典) 以及美國的政治菁英份子，不管是政務官、議員、或是高級文

官皆有相當高之教育水準，平均有 88% 以上具有大專學歷，比一般民眾的 8% 顯然高出甚多。更重要的是，這些菁英份子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來自於社會階層較高的家庭，顯示出其社會背景之同質性。相反地，根據 Kim & Patterson (1988) 對肯亞、土耳其、南韓、比利時、義大利、和瑞士六個國家議員的分析，卻發現議員的社會背景與經驗呈現多元化的現象，並沒有想像的同質化。由於議員是民選出身，因此較能反映社會生態與需求，因此出身背景較多元化。Aberbach et al. (1981) 也證實議員的社會背景不若高級文官同質化。在另一方面，Kim & Patterson (1988) 亦發現這六個國家之議員對於議員應扮演的角色，問題的重要性與優先順序等問題的看法相當分歧；但是對於衝突來源，提出異議的權利，以及專業化等問題具有相當程度之共識。不過此兩分研究皆以全國性菁英為分析對象，而不是以地方菁英為對象。

本文擬就菁英之教育程度、父親之職業、本人之出生地、政治世代、以及性別等背景因素，來瞭解這些因素對菁英衝突認知之可能影響。由於個人背景強調個人早期的經驗對個人態度之影響，與個人的社會化過程相關，因此我們稱為社會化理論。

接受訪問的六縣市菁英的教育程度為研究者佔 11.1%，大專程度者佔 47.3%，高中程度者有 32.9%，只接受初中和小學教育者分別佔 5.7% 與 32.9%。地方菁英的教育程度雖然較一般民眾高，然而比起中央的菁英，地方菁英之同質性便降低很多。當被問及是否有重大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完成以及這些衝突對地方的干擾大不大時兩個問題，教育程度之不同並未造成對此二問題認知之顯著差異。不過若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僅受過小學教育者對衝突影響發展之認知較高（見表十）。

表十：個人背景變數與對衝突干擾地方事務之認知

		有衝突	無衝突	Chi-square	顯著水準
教育程度	小學	70.0	30.0	2.54	P > 0.05
	初中	50.0	50.0		
	高中	56.0	44.0		
	大專	61.4	38.6		
	研究所	65.0	35.0		

政治世代	第一代	56.4	43.6	0.78	P > 0.05
	第二代	61.6	38.4		
	第三代	60.0	40.0		
性別	男性	59.4	40.6	0.04	P > 0.05
	女性	62.8	38.2		
初生地	本縣市	61.2	38.8	2.51	P > 0.05
	鄰近	61.0	39.0		
	外縣市	57.6	42.4		
	外省	46.9	53.1		

當我們更進一步分析不同教育程度之地方菁英對十一項事務的看法時，雖然只有對變遷與否一項達 0.05 的統計顯著水準，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其中的九項中，小學程度者持這些差異會造成居民分裂之百分比最高。對於派系以及政治觀點差異兩項的百分比竟然達百分之百，而研究所程度者則只分別佔 61.0%與 65.9%。另外，對於老年與青年以及教育差異，低教育程度者與高教育程度者之看法迥異，兩者相差分別為 33.3%與 16.2%，接近顯著水準（見表十一）。小學教育程度者認為這些項目會造成居民明顯分裂之平均百分比為 49.4%，顯然高於研究所程度之 31.7%。

表十一：教育與對十一項問題之衝突認知之關係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專	研究所	顯著水準
老年與青年	45.5	15.9	32.5	18.3	12.2	0.06
教育	45.5	38.1	41.5	31.9	29.3	0.07
所得	54.5	50.0	39.2	33.5	31.7	0.12
宗教	27.3	25.0	11.0	18.0	12.2	0.70
派系	100.0	76.2	74.2	71.3	61.0	0.49
政治觀點	100.0	66.6	63.0	74.3	65.9	0.27
城鄉差異	50.0	30.0	34.2	24.1	19.5	0.62
勞工與雇主	36.4	35.0	33.0	29.5	31.7	0.20
社會背景	36.4	40.0	31.6	27.6	31.7	0.55
省籍差異	18.2	5.0	20.8	21.8	17.1	0.51

變遷與否	30.0	25.0	29.6	26.0	36.6	0.003**
平均百分比	49.4	37.0	37.3	34.2	31.7	—

**爲 $p < 0.01$

* 爲 $p < 0.05$

父親的職業常被用來衡量一個人的出身背景，Putnam (1973: 146) 發現父親的職業與菁英對衝突之認知有明顯關連，即使是控制政黨因素。他甚至更進一步推論一個人對政治和社會衝突之取向，乃是從很早期就形成，而且此種取向在成人後，仍然繼續維持，不受政黨和意識形態之影響。臺灣地方菁英的出身背景相當複雜與多元，而其中又以父親務農出身者爲最多，佔 47.6%，另外有 18.3% 經商，還有 10.6% 爲公務員。至於父親爲律師、醫生、或民意代表者之百分比並不高，顯然這些地方菁英並未佔階級的優勢。父親的職業與地方菁英對所有衝突的看法並無顯著的關係，不過父親爲民意代表者，認爲衝突會影響地方發展或造成居民分裂的百分比較低，顯然他們並不視衝突爲不正常的現象。不過因爲父親爲民意代表者在我們的樣本中並不多，所以在統計檢定上皆不具顯著水準。

地方菁英的出生地也在本文探討之列，我們發覺七成左右之地方菁英是本地人，亦及在本縣市出生及成長，另外有一部份出生於鄰近縣市。至於出生於其它縣市或大陸各省市者之百分比不到兩成。同樣地，菁英的出生地亦不影響他們對所有衝突問題的態度（見表十）。

年齡是另外一個經常被考慮的變項，Eldersveld (1995: 107) 將年齡層分爲五十歲以上和五十歲以下兩個類別，他發現年紀輕者對於衝突的關切高於年長者，然而此種差異不大，是可以被忽視的。不過 Eldersveld 並未提及爲何將年齡分爲五十歲以上和五十歲以下兩個團體。爲了慎重起見，本文將採取政治世代 (Political generation) 之觀念來加以分類。政治世代強調出生約在同一時期的人，擁有共同的社經環境和歷史背景，傾向於有相近的政治態度。此種態度乃是混合了個人成長的生命循環現象與某段時期的一些特殊歷史事件的經歷而形成的。然而究竟那些歷史事件以及在那種情況之下，會影響當時人們的政治態度，往往難以確定，因此要清楚的分割政治世代的時間點是相當困難的 (Delli Carpini, 1959)。本文將採用劉義周 (1993: 58) 的作法，考慮臺灣的重大歷史事件（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經濟轉型（一九六五年經濟不再依賴美援），把臺灣過去分爲三個時期，一九四九年之前爲一期，一九四九到一九六

五年為一期，一九六五年後為一期。第一代為五十五歲以上者，第二代則為五十四歲以下，三十九歲以上者，第三代則為三十八歲以下者。

此三個世代中，第三世代所佔的比例最少，蓋成為菁英份子總需要某種程度的歷練，因此以四十歲至六十歲所佔的比例為最多。表十可以看出三代之間對於衝突是否會干擾地方事務之發展以及此種干擾之程度的態度，基本上無顯著之不同。但是就個別的問題，如：派系、城鄉、社會背景、贊成與反對變遷之差距，不同世代之間確實有顯著之不同（見表十二）。一般言之，第一世代，即年紀較長者，較不認為衝突會造成居民分裂，而第三世代則傾向於對衝突之關切。或許是第一世代菁英經歷了大陸淪陷，政府遷臺，以及二二八等重大歷史事件，對於地方恩怨與衝突較能處之淡然；反之，第三世代菁英或許是剛進入政治圈不久，因此，對於地方之衝突對地方的可能影響，較感憂心。

表十二：政治世代與對十一項問題之衝突認知之關係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顯著水準
老年與青年	22.2	22.8	28.6	0.15
教育	33.0	36.9	34.3	0.16
所得	64.0	37.4	37.1	0.22
宗教	20.0	13.5	17.6	0.14
派系	73.2	69.1	86.1	0.04*
政治觀點	61.8	70.3	88.9	0.002**
城鄉差異	25.5	28.4	34.3	0.03*
勞工與雇主	28.0	33.3	28.6	0.14
社會背景	25.0	32.5	31.4	0.03*
省籍差異	13.9	23.8	14.3	0.14
變遷與否	18.2	34.6	22.3	0.02*
平均百分比	32.25	36.60	38.50	——

** 為 $p < 0.01$

* 為 $p < 0.05$

最後一項要討論之背景因素是性別。從小父母、老師、媒體等社會化的機構便傳達給我們有關男性與女性差異之訊息，甚至家長對於男嬰與女嬰的對待與教養方式也有差別待遇。另外，社會對於性別角色之期望亦不盡相同。儘管

如此，在過去很多民意調查中，發現性別對於很多問題的態度與看法並無顯著差異，除了與戰爭以及和平相關的問題之外（Erikson et al. 1991：198-201）。

本樣本中女性地方菁英只佔 9.5%，由此可見女性菁英的比例相當少，在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發現，基本上政治仍是男性的天下。不過表十顯示性別對衝突的認知以及此種衝突對地方干擾程度並無關聯。另外，對於十一項問題是否造成居民分裂，男性與女性基本上沒有什麼顯著差異，只有老人與青年之差異接近統計顯著水準（參看表十三）。另外一項兩性態度歧異較大的是教育之差異。女性由於對家庭老弱幼小肩負較大責任，以及擔負家中孩童之教養重任，所以她們對於老人與青年以及教育之差異所造成之問題較為敏感。

表十三：性別對十一項問題之衝突認知關係

	男性	女性	顯著水準
老年與青年	22.4	41.4	0.0652*
教育	34.1	48.2	0.2284
所得	35.2	45.1	0.6485
宗教	15.5	10.3	0.7213
派系	71.9	77.4	0.8231
政治觀點	69.9	77.4	0.5839
城鄉差異	29.0	24.1	0.3907
勞工與雇主	29.8	41.4	0.4969
社會背景	29.2	39.7	0.3959
省籍差異	20.0	22.6	0.4685
變遷與否	28.2	35.5	0.5300
平均百分比	35.0	41.9	——

* 為 $p < 0.1$

八、綜合討論與結論

前面在探討不同的理論和因素與菁英對衝突的看法時，僅是就個別變數來加以觀察，並未控制其它變數。為解決此問題，筆者先用洛基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來檢驗所有自變數對衝突是否干擾發展之認知的影響。因為對衝突

影響之認知在此為二分名分變數（其答案只有「有」與「沒有」），並不適合使用一般最小平方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來分析，否則將會違反最小平方方法的假設，亦即依變數必須是具有連續性的測量，以及它的誤差項的變異量是相等的，且具有常態分配等特性的基本假設。至於洛基迴歸分析法之依變數可以是二元抑是多元的名份變數，而不違反誤差變異量相等之前提，同時又可以將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自變數同時放入模型中分析。在洛基迴歸分析中，所有變項仍以縣市地區最具影響力，而且除了基隆市與花蓮縣之外，其它四縣市在整個洛基模型中，皆具有顯著水準（見表十四）。至於前面探討的個人背景，所屬職位與政黨等因素皆不具顯著水準。由表十四之模型 I 看出，這些因素一點解釋力都沒有。若是我們將這些因素排除，模型 II 的解釋力不但不減少，反而些微上升。不過此模型並不令人感到完全滿意，它對於回答有衝突正在干擾地方事務的發生者預測力較高；但是對於回答沒有者之解釋力卻不高，顯然還有其它因素影響這些人的看法，有待更進一步研究。

除此之外，十一項可能造成居民分裂之事項中，又以派系之差異對衝突影響發展之認知影響最大，其次是勞工與雇主之差異，再其次是省籍與教育之差異。至於政治觀點之差異，在控制派系分歧後，其影響力便消失了。

若是就地方菁英分別對十一項事務衝突是否已經造成居民分裂的看法來討論，角色論理並不具任何影響力，亦即菁英並不因其所處地位為官僚、民意代表、黨務人員、或是社團人士而有所不同。個人背景方面則僅有教育程度和年齡對某些問題有影響力（見表十五），但是其影響力皆不大。至於政黨方面，民進黨對派系、政治觀點、社會背景和省籍差異等問題與國民黨和無黨籍人士的看法皆不同。菁英所處之縣市在十一項問題中，除了教育與所得差異之外，對其它九項皆具有顯著影響，且在九項問題中的其中七項是所有變數中最重要者，顯示環境背景理論的重要性。

表十四：影響地方菁英對衝突干擾地方事務認知的因素

	MODEL I		MODEL II	
	B	R	B	R
地區				
臺中縣	-0.68	-.045*	-0.58**	-.058
高雄縣	-1.45	-.147***	-1.35***	-.171
新竹縣	-1.15	-.102***	-.987***	-.105
臺南市	-1.23	-.120***	-1.14***	-.136
基隆市	-0.10	.000	—	—
職位				
官員	-.424	.000	—	—
民意代表	-.351	.000	—	—
社團代表	-.308	.000	—	—
政黨				
國民黨	-.440	.000	—	—
民進黨	-.713	.000	—	—
個人背景				
年齡	.017	.000	—	—
教育	-.063	.000	—	—
性別	.082	.000	—	—
Constant	.459		.293	
-2 Log Likelihood	451.03(P=0.000)		459.95(P=0.000)	
Goodness of Fit	355.44(P=0.284)		358.00(P=0.416)	
% of Correctly Predicted	63.66%		63.97%	

** P < 0.01

* P < 0.05

表十五：影響十一項衝突事項之迴歸分析

	在迴歸公式中呈顯著水準之變數	R Square
老年與青年	教育程度、地區(中縣)	.07
教育	教育程度、年齡	.02
所得	教育程度、政黨(民進黨)	.08
宗教	地區(花蓮縣、新竹縣)	.04
派系	地區(高縣、中縣、基市、竹縣)、 教育程度、政黨(民進黨)、年齡	.27
政治觀點	政黨(民進黨)、地區(中縣、高縣)、 年齡	.09
城鄉差異	地區(基隆、南市)、教育程度、年齡	.10
勞工與雇主	地區(高縣、中縣、南市)	.10
社會背景	地區(竹縣)、政黨(民進黨)	.06
省籍差異	地區(南市、竹縣)、政黨(民進黨)	.13
變遷與否	地區(基市、竹縣、高縣)、年齡	.06

整體言之，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地方菁英對衝突之態度呈現與他國不同的模式。有六成之地方菁英表示地方有衝突發生，而這些人幾乎都表示此種衝突已經干擾地方的發展，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顯然我國地方菁英對衝突最感到憂心。但是在另一方面，若就各別問題來分析其差異是否會造成居民分裂時，回答會的平均百分比卻又是最低的。

此種平均百分比最低的現象，可能是因為我國地方菁英關切的主要為派系與政治觀點之差異，而對其他衝突卻不甚關切，使得平均百分比被拉低了。接著我們探討究竟是那些因素足以解釋地方菁英對衝突看法之差異，我們發現社會背景和菁英之職位與菁英對衝突之看法幾乎無關。至於政黨歸屬方面，民進黨顯然對衝突問題較為關切，尤其是在所得、社會背景、省籍、派系以及政治觀點之差異，在控制其它變數之後，皆呈現顯著水準。不過影響地方菁英對衝突看法最重要的因素是縣市本身之差異，人口較多且派系複雜之縣市的地方菁英，顯然對衝突之認知較高，對十一項衝突是否會造成居民分裂之平均百分比亦最高，由此可見環境背景理論較能解釋我國地方菁英對衝突之態度。

參考書目：

- Aberbach, Joel D., Robert D. Putnam and Bert A. Rockman. *Bureaucrats & Politicia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Allison, Graham T.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 Little, Brown, 1971.
- Almond, Gabriel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Boston : Little, Brown 1966.
- Converse, Philip 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Apter,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 Free, 1964.
- Delli, Carpini. "Age and History : Generations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R. S. Sigel, *Political Learning in Adulthood*, pp. 11-55.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Dye, Thomas R. *Who's Running America?* Englewood Cliff : Prentice Hall, 1983 .
- Eldersveld, Samuel J., Jan Kooiman and Theo van der Tak. *Elite Images of Deutsh Politics : Accommodation and Conflict*.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 Eldersveld, Samuel J., and Siemienska. "Elite Conflict Orientations in Polish and U. S. Cit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1989) : 309- 329.
- Eldersveld, Samuel J. et al., *Local Elites in Westen Democracies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U. S.,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 Boulder : Westview, 1995.
- Erikson, Robert S., Norman R. Luttbeg, and Kent L. Tedin. *America Public Opinion*. 4th edition. New York : Macmillan, 1991.
-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Glaser, James M. "Back to the Black Belt : Racial Environment and White Racial Attitudes in the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6-1(February 1994) : 21-41.
- Heinz, John P. et. al. "Inner Circles or Hollow Cores? Elite Networks in National Policy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52-2 (May 1990) : 358-390.
- Higley, John and Gwen Moore. "Elite Inte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 Austral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September 1981) : 581-597.
- Jacob, Philip. ed. *Values and the Active Community*.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1971.
- Kim, Chong Lim and Samuel C. Patterson. " Parliamentary Elite Integration in Six N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July 1988) : 379-399.
- Lasswell, Harold D. and Daniel Lerner, eds.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 Studies in Coercive World Ideological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65.
- Putnam, Robert. *The Beliefs of Politicians*. New York, N.J.: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utnam, Robert. "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 Contending Elites in the Policy Process." In *Perspectives on Public Policy-Making*. Edited by George C. Edwards and William B. Gwyn. New Orleans : Tulane University, 1975.
- Putnam, Rober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Englewood Cliffs : Prentice, 1976.
-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by Maurice Cranston. Middlesex, England : Penguin Books, 1968.
- Suleiman, Ezra. *Politics, Power, and Bureaucracy in France :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Wahlke, John, Heinz Eulau, William Buchanan, and LeRoy C. Ferguson. *The Legislative System*.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1962.
- 林仲修。《水里鄉政治權力結構之分析》。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 紀俊臣。《新竹地區的領導系統與權力結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
- 苗蕙敏。《臺灣地區地方選舉中派系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 唐志成。《港都風雲變幻—基隆市的政治勢力》。載於台灣地方勢力分析，時報雜誌編輯部編，頁 9-22。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
- 陳明通、朱雲漢。《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資料的分析》。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彙刊，第二

卷，第一期，1992，頁 77-97。

陳陽德。“臺灣民選地方領導人物變動之分析。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陳騰芳。“派系式微，宗親突起—新竹地區派系分析。”載於台灣地方勢力分析，時報雜誌編輯部編，頁 58-71。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

彭基原。高雄縣地方派系結構及其影響。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黃德福。“選舉、地方派系、與政治轉型—七十八年底三項公職人員選舉之省思。”中山社會科學，第五卷，第一期，1990，頁 84-96。

楊國樞。“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係。”載於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文崇—與蕭新煌主編，頁 9-24。臺北：巨流，1988。

趙永茂。臺灣地方中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

趙永茂。臺灣基層政治菁英之民主價值取向—一般性及三個代表個案之分析。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劉超。“國姓當年此駐兵—台中縣地方派系的形成和演變。”載於台灣地方勢力分析，時報雜誌編輯部編，頁 97-111。臺北二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

劉義周。“台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中華民國政治轉型的新挑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蔡明惠。現行臺灣地方自治下之地方權力結構—河口地方派系之個案分析。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Local Elites' Perception of Conflict

Shiow-Duan Ha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paper dealt with the elite perception of conflict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 study also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osition, of party, as well as social class origins as determinants of elite views on conflict, that is whether elite conflict orientations as product of early socialization, or the result of exposure to party and group politics, or explicable in terms of community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leaders.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during the summer of 1993 in six different counties or cities. Local elites interviewed including important local officials, city councilmen, provisional councilmen, national assemblymen, and national legislatures, group leaders, and local party leaders.

Compared with other democratic countries, Taiwan's elites reported the lowest aware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conflicts, however, they were much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interfer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ll the possible factors were examined, we found that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ole theory had almost no effect on elites' perception of conflict in their communities. Elites' party belongings had some effect, but not strong. The most important explanatory factor was the Context where they are leaders. Local elites responded to conflicts differed by city.

Keywords : local elites , conflict , role theory , socialization theory , group theory , context theory .